

《高昌館課》中的漢回對音

莊子儀*

摘要

「高昌館」為明永樂年間由朝廷設置的四夷館之一，這個機構除了培養翻譯人材，也蒐羅了朝廷與西域各國往來的奏章，即《高昌館課》。《高昌館課》不僅有漢文一回鶻文對照，亦涵括了許多漢回對音、漢譯域外專有名詞及漢語借詞。本文旨在分析這批對音字詞，以觀察明代漢語的語音現象。

文中前兩段介紹《高昌館課》的成書背景、文獻版本及前人研究成果，第三段簡介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回鶻文的語音系統。第四段先指出《高昌館課》中對音的類型分為三種：第一類為西域專有名詞，第二類對漢語詞彙對音，第三類為漢語借詞；再來則就聲母、韻母分析漢回對音，解釋其中值得觀察的語音現象，並修正《明代文獻〈高昌館課〉》一書中的轉寫錯誤。

本文透過《高昌館課》中的對音，推論明代中葉（15世紀至16世紀中）的漢語有如下特點：1.微母開口正在消失，而微母合口尚存，2.見系一、二等與三、四等間的對立開始消失，3.聲母可能有捲舌音化，4.唇音合口字尚保留了u介音，5.有顎化現象的前兆，6.-m韻尾正在消變。

關鍵詞：高昌館課、回漢對音、明代語音、近代音

*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目前任教於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一、前言：《高昌館課》的成書背景與性質

中國元、明時期，朝廷均設有與各國使者交涉、溝通翻譯的機構。元代有「會同館」；明代承襲元代，先有「會同館」¹，後有「四夷館」²。明代這些機構除了負責口譯、筆譯等工作，亦須培訓國子監生成為外交人才，因此編寫了一批漢語與各民族語言對照的字書，統稱為「華夷譯語」³。部分四夷館也蒐羅、保存了朝廷與周邊各國的往來奏章，亦收入「華夷譯語」中。這些奏章稱為「來文」，因為「來文」亦作為教學之用，因此又稱作「課」。

因「華夷譯語」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依現今學術界普遍的共識，版本可分為四大類。見下表⁴：

表1 「華夷譯語」之版本

版本名稱	朝代、作者	內容
洪武本（甲種本）	明朝 <u>火源潔</u> 、 <u>馬沙亦黑</u> 等	僅有《蒙古譯語》一種。包括蒙古語原文、漢字、漢字音譯蒙古語。
永樂本（乙種本）	明、清二朝四夷館館員	有諸番語和漢語對譯的《譯語》及《雜字》；亦有部分諸

¹ 《大明會典·卷一百九·禮部六十七》：「舊設南北兩會同館，接待番夷使客。」《大明會典》（三），新文豐，1976，頁1627。

² 《大明會典·卷二百二十一》：「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大明會典》（三），新文豐，1976，頁2948。

³ 《絲綢之路》頁296：「『華夷譯語』這個名稱，目前在學術界有兩種不同的含義。狹義的『華夷譯語』是一部具體的書名，即明洪武年間火源潔等編撰的蒙古語—漢語分類詞匯表……。廣義的『華夷譯語』指明、清兩代四夷館、會同館為『番語』、『番文』教學所編撰的一大批漢語—番語分類詞匯表，有的還包括『來文』的匯集。」本文所採用的是廣義的指稱。

⁴ 筆者依據〈日本學者對明「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狀況〉一文（烏雲高娃，2002），將華夷譯語之版本整理為表格，以方便讀者閱讀。其中甲種本、乙種本、丙種本的分類法，乃源自於日籍學者石田幹之助；此為日本學界普遍使用的分類法。而後法籍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將北京故宮所藏的《譯語》、《雜字》定為「丁種本」。

		番語和漢語互譯的「來文」。
會同館本（丙種本）	明末 <u>茅瑞徵</u>	只有漢語和漢字音譯諸番語，沒有諸番語的原文，亦無「來文」。
故宮本（丁種本） 或稱多續《華夷譯語》	清朝會同四譯館館員	共有 42 語種、71 冊本。

簡言之，「華夷譯語」可以分為三大系統：一為明代會同館所編、一為明代四夷館所編、一為清代會同四譯館所編。此三系獨立編成，所收輯的番語類別各異，收錄之詞彙條目亦不相同。除了甲種本、丙種本有具體的作者可考，乙種本及丁種本作者有哪些人？分別操持何種語言？目前皆不清楚。

明代會同館、四夷館中，與回鶻有關係的單位分別為「畏兀兒館」⁵及「高昌館」。畏兀兒館所編纂的文獻，目前保存下來的有《畏兀兒館譯語》，屬「華夷譯語」丙種本；高昌館留下的文獻則有《高昌館譯語》（或稱《高昌館雜字》）、《高昌館課》（或稱《高昌館來文》），此二者屬「華夷譯語」乙種本。《畏兀兒館譯語》及《高昌館譯語》是漢文—畏兀兒文對照的字書，而《高昌館課》則是明朝至清初，朝廷與周邊地區、國家外交活動的文書，所涉及的地方有哈密、高昌、曲先、火州、土魯番等近二十處之多，來文共 80 餘篇，均為漢文、回鶻文⁶對照。這些朝貢記錄中除了大量的地名及人名外，

⁵ 《大明會典·卷一百九·禮部六十七》：「凡通事額員，成化五年奏定……計四夷一十九處額設通事六十員名。……畏兀兒二員名……。」《大明會典》（三），新文豐，1976，頁 1628。

⁶ 有學者認為「高昌館」所紀錄的語言應為察合台語，而非回鶻語。此論述可能源於明代「畏兀兒」一地名已然消失，幾乎被東察合台汗國取代，因而推論明代與舊有高昌地區各民族交流時所操持的語言，應為察合台語，而非回鶻語。對此，筆者的看法較為保留。理由之一為《高昌館譯書》中所記載的部分詞彙，如「天」：t(ä)ngri（漢語注音「騰克力」），此為延襲唐、五代時期以來的回鶻文詞彙；而現代維吾爾語的「天」為 اسمان（阿思曼），此詞彙借自波斯語。一般認為，察合台語為現代維吾爾語的祖先；因此就《高昌館雜字》記錄的「天」字來看，其語言屬回鶻語的機率較高。固然這亦可以「明代察合台語受波斯語影響未深，故尚使用回鶻語詞彙」之說來解釋，但總歸目前缺乏直接證據證實《高昌館譯書》、《高昌館課》所紀錄者為察合台語，本人暫不採信此說。又，突厥語的分支至今學界看法仍莫衷一是，以現代各突厥語族的情況來看，各突厥民族語間的差異遠小於印歐、漢藏語系同

尚有諸多回鶻文音譯的漢語詞彙。透過這些專有名詞及漢回對音，可一窺明代漢語的語音現象。

現今得見的《高昌館課》皆屬乙種本，然而世界各地仍藏有不同版本的《高昌館課》。茲將各版本簡述如下：

1. 東洋本：共《高昌館來文》一卷，文字 54 頁，收錄漢、回鶻文對照奏摺文書 15 件。現藏於日本東洋文庫，並在中國民族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有曬藍本。此本收錄篇章與國圖本略有出入，從漢字的書寫形體來看，應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⁷。
2. 聖彼得堡本：為聖彼得堡亞州博物館之抄本，拉德洛夫 1980 年出版的回鶻文《福樂智慧》維也納抄本，附錄有此版本的《高昌館課》，共一篇。
3. 中國國家圖書館本（後稱國圖本）：共《高昌館課》四冊。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2009 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中華再造善本：高昌館課》共四冊，即為此版複印。中央民族大學胡振華、黃潤華對該版介紹如下：

（《高昌館課》）共四冊，明抄本……封面鈐有康熙朝進士張瑗的印章「張瑗蘧若章」、「玉堂侍御」兩方。前三冊以漢、回鶻兩種文字對照，後一冊則為漢文與回鶻式蒙古文合璧。……前三冊包括文書 87 件。⁸

4. 古香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02 年出版《續修四庫全書》，收錄

語族間的差別，兼之突厥語民族長期混居，使得語言的劃分極為不易。然而換個角度思考，回鶻語與察合台語有著高度共性，甚或可以視回鶻語與察合台語為一歷時性的語言，僅因政權、宗教等因素，導致其語言名稱及書寫文字產生變異。下文所介紹之「回鶻語語音性質」，亦多可套用於察合台語中；這並不影響利用《高昌館課》進行漢語對音研究。

⁷ 此二版本對照，可從漢文「面」、「辛」（幸）、「久」、「回」（同）等字，明顯看出正、俗書體的不同及書寫訛誤。筆者由此推斷兩種版本應非同一人所作。

⁸ 胡振華、黃潤華，1981，《明代文獻〈高昌館課〉》，頁 3。

《四庫全書》以外的現存中文古籍。其中有〈華夷譯語不分卷（附高昌館來文一卷、譯文備覽一卷）〉，並於目錄註明作者為「明火原潔」。這部〈華夷譯語〉的出處不詳，譯語及譯文備覽均非回鶻文。然其中收錄《高昌館來文》共 56 篇，而第一篇右下角印有「古香樓」、「休寧汪季青家藏書籍」等印，應為清代藏書家汪文柏蒐藏之版本。本文暫稱之為「古香樓本」。

5. 巴黎本：共 41 篇來文，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學館。

上述各版本之《高昌館課》篇章順序略有不同，且各版本《高昌館課》均無篇章編號。《明代文獻〈高昌館課〉》一書已為國圖本編次，為了便於讀者檢索，本文的篇章序號暫從之。

據田衛疆的考察，《高昌館課》中所收錄的來文年代，最早可追溯自明永樂年間（1405），最晚則到嘉靖年間（1545）⁹。雖非每篇來文都能在史書中找到相對應之史實，但仍可推定《高昌館課》成書的大致年代，應是座落於十六世紀。有許多學者指出，《高昌館課》的來文並非原本的公文奏章，胡振華即曾在其《明代文獻〈高昌館課〉》一書的前言中提及：

高昌館課中的來文，看來是先寫成漢文後譯成回鶻文的，而且又是逐字直譯，因此它不可能正確反映當時畏兀兒人的口語情況，特別是很難從中看出當時畏兀兒語的語法特點¹⁰。

意見相同者有劉迎勝：「經過研讀，學者們發現這些所謂表文多數語句不通，有些甚至是按漢語的詞序寫成的，其中還包含不少漢語詞。¹¹」，以及米熱古力·黑力力等人：「……句子實際是按照漢語語序將維吾爾語詞匯堆疊而

⁹ 田衛疆，〈明《高昌館課》諸函文年代考釋〉，原載於《西北史地》1984 年 4 期。

¹⁰ 同註 9，頁 9。

¹¹ 劉迎勝，〈古代中原與內陸亞洲地區交往中的翻譯和語言學問題〉，《華言與蕃音》，頁 80。

成……整個句子缺乏連綴各詞並使內容完整和通順的句法成分。¹²」依劉迎勝的看法，這些來文應該是四夷館的教育因應需求而撰寫的¹³，然而這也是《高昌館課》這部文獻的特點，這些來文不僅有漢語借詞，甚至還包括其他回鶻文獻鮮見的音譯漢語動詞、音譯漢語介詞等等。本文的重心即在擷取這一批對音詞彙，畫分其歷史層次，再進一步觀察其中所反映的漢語語音現象。且《高昌館課》所紀錄的文書年代較具體，至少能確定其時間點不早於 15 世紀初；在研究語音上，有更具體的時間點可供參照，這個特點是《高昌館譯語》所無的。

二、研究回顧

過去對於《高昌館課》的研究不多，大多數研究集中在《高昌館譯語》及《畏兀兒館譯語》。《高昌館譯語》等書較《高昌館課》更受到學術界重視的原因，蓋因「譯語」為詞彙集，其中豐富的回鶻與漢語讀音對照，無論用以認識回鶻語或漢語，都是相對豐富的材料。然而《高昌館課》因回鶻文法不通順、對音詞彙少，無論進行回鶻語語音或語法的研究，都不是十分理想。

目前與《高昌館課》相關的論著，有匈牙利 Louis Ligeti（李蓋堤）（1967）¹⁴、中國胡振華及黃潤華（1981）、包力高（1996）、馬克章（2015）、米熱古力·黑力力及阿普拉江·玉蘇普（2017）等。Louis Ligeti 援引巴黎本《高昌館課》的內容，介紹《高昌館課》的性質及內容，並擇 22 則篇章進行簡要的翻譯及注釋。包力高引用《高昌館課》中的部分語音，作為探討蒙古文字 G 實際音值的比較材料¹⁵。包氏指出《高昌館課》中的 q 書體

¹² 米熱古力·黑力力、阿普拉江·玉蘇普，2017，〈《高昌館來文》及其翻譯簡論〉，民族翻譯，頁 21。

¹³ 劉迎勝：「四夷館匯集各番『來文』用於教學……但這些表文並非原本，明顯是帶有漢語背景的人編造的，其作者很可能是四夷館的教師」，《華言與蕃音》，頁 35。

¹⁴ Louis Ligeti, 1967, Documents Sino-ouigours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20, No. 3, pp. 253-306.

¹⁵ 包力高，1996，〈蒙古文字母 [G] 的古代讀音及其演變〉，民族語文，1996 年第 2 期，頁 57-63。

（字形旁打雙點）有 /q/ 跟 /ɣ/ 兩種讀音，前者如 yaqan（近、近處），後者如 qaḡan（可汗）。然而包氏沒有說明從同一字形判斷出 /q/、/ɣ/ 兩種讀音的依據，且所舉之例子「qaḡan 可汗」，顯然缺乏歷史語音演變的概念¹⁶。馬克章引用《高昌館課》中的漢詞，作明代胡漢接觸下的詞彙整理，以證明該時期西域時仍通行漢語。米熱古力·黑力力及阿普拉江·玉蘇普，則是擇取《高昌館課》聖彼得堡本及東洋本相同的一篇內容，從詞彙、語法等角度進行本文分析；該文篇幅雖短，但梳理細緻，對回鶻詞彙的解釋可說是目前研究中最詳實的，且文中指出不合理的回鶻語法型式並進一步予以修改，可謂為《高昌館課》的翻譯性質提供了極有力的證據。

由上可知，就《高昌館課》進行語音相關的研究，可說是至今闕如。《明代文獻〈高昌館課〉》是研究《高昌館課》時不可忽略的一本著作。該書為黃振華、胡潤華二人將國圖本《高昌館課》的回鶻文文字轉寫為拉丁字母，每個字彙下方再加上簡單的中文翻譯。該書的斷句、轉寫分行也依據原文，作者群秉持的態度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推測出版的用意應為推廣《高昌館課》一書。然而該書的轉寫存在幾個問題：

1. 採用維、哈新文字字母：

哈薩克文分成兩種，一是阿拉伯字母，一是斯拉夫字母；「維、哈新文字字母」可能是指中國大陸在 1954 年修訂阿拉伯字母而成的新哈薩克文，它同時也用來作為維吾爾語的拼音符號。然而回鶻文與哈薩克文的元音、輔音數量並不相同，加上回鶻文屬於已消亡的語言，許多學者只能判斷其音類而非音值，故而使用現存且音類較多的標音系統，有時會造成強加解釋的疑慮，並不適合。

2. 轉寫受到漢語拼音影響：

¹⁶ 「可汗」一詞最早見於 8 世紀的突厥語碑銘中（如：闕特勤碑），彼時作 qaḡan；稍晚的 8 世紀末回鶻文文獻中，已出現 ḡan（汗）或 ḡaqan（可汗）等語音形式，這是因為突厥語中出現 q > ḡ 的語音演變。《高昌館課》中，若依文字型式，可汗一詞的轉寫即為 qaḡan。關於可汗一詞的音變過程，見李樹輝：2004，〈古代回鶻文史詩《烏古斯可汗的傳說》有關問題考辨〉，《新疆文物》。

這種情況多出現在漢回對音當中。以回鶻文的 t、d 為例，t/d 在回鶻文中書寫形式不同，且回鶻文的 /d/ 不會出現在字首；而胡、黃往往依據現代漢語的拼音更改轉寫。如漢語「的」，其對音依據《高昌館課》中的回鶻文應作 /ti/，胡、黃均改為 /di/；「大明」之「大」，依據文本應為 /tai/，胡、黃均改為 /dai/。這類擅改的情況亦出現在 k/g 等眾多組字母轉寫當中，對研究音韻地位極為不利。

3.校對不精：

《明代文獻〈高昌館課〉》中，漢文與回鶻文譯文均有多處筆誤或印刷產生的錯誤。以漢文為例，如「速檀」誤植為「蘇丹」，「都督」誤譯為「頭目」等，餘不一一列舉。

由上可知，《明代文獻〈高昌館課〉》的轉寫及刊印均不夠嚴謹，不宜據該書逕行對音研究。

縱使《高昌館課》作者身分不詳、回鶻文語法錯誤百出，對音詞的數量也不如《高昌館譯語》豐富，其在語音上的價值仍不容忽視。前人統整《高昌館課》翻譯的性質，在在顯示這部文獻的作者可能並非以回鶻語為母語，很大機率是由懂回鶻語的漢人擔綱翻譯與編輯的工作；因此《高昌館課》中的對音，更可能貼近當時實際漢語的面貌。加上《高昌館課》具體的年代特徵，對於填補近代漢語史的空缺而言，是相當珍貴的一部文獻。固然，受限於對作者資訊的匱乏，有些語音現象不易給出明確的結論，只能停留在推測階段；然而透過文獻現象的梳理，亦是掌握譯者背景的方式之一，而這正是我輩欲進行的工作。

三、本文的研究基礎及回鶻文字語言概述

（一）回鶻文語音系統概述¹⁷

1.元音系統：

¹⁷ 此處回鶻文語音系統概述，改寫自筆者之碩士學位論文。詳請見：莊子儀，《回鶻文〈金光明經〉所反映的語音現象》，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頁 9-11。

回鶻語共有 8 個元音音位，分別是 a、ä、o、ö、i、ï、u、ü；音位分布如下：

表 2 回鶻元音系統

	展唇元音		圓唇元音	
前元音	ä	i	ö	ü
後元音	a	ï	o	u

(1)長元音：除了以上 8 個元音，回鶻文中尚有長元音存在，一般以元音連寫（如「龍」：luu）的方式表記。但實際上，回鶻文文獻中長、短元音的對立並不明顯；而在元、明的回鶻文中，幾乎鮮見長元音的存在。

(2)無複元音：回鶻文沒有複元音，僅在外來借詞中有複元音出現。

(3)元音和諧：元音和諧是回鶻語中重要的特色。意即單個詞語中，第一音節的元音性質，會影響其後音節的元音性質——包括前、後及圓、展唇——，所有元音的性質必須保持一致。

例如：lar/lär 為回鶻文複數型態的詞綴

tängri-lär「眾神」（ä-ä）

burxan-lar「眾佛」（a-a）

另外如一般詞彙：yaruq「光明」（a-u）、bilgä「智慧」（i-ä）、törü「禮儀、法規」（ö-ü）等，均有前、後元音發音部位及方法一致的現象。

2. 輔音系統：

(1)輔音音位：輔音音位的數量各家看法不一，主因為回鶻文字母隨時代的推進，及外來語的加入，使得輔音數量逐漸增加。依據不同時代的文獻，歸納出來的回鶻文輔音也會有數量上的差異。

表 3 回鶻輔音系統

		雙唇	唇齒	齒間	舌尖	舌葉	舌面	舌根	小舌
塞音	清	p			t			k	q
	濁	b			d			g	

擦音	清	w	f		s	š			h
	濁		v		z	ž	y		ğ
塞擦音	清					č			
	濁								
邊音					l				
顫音					r				
鼻音		m			n			ŋ (ng)	

其中 /v/ 是比較有爭議的音位。因為回鶻文字母數遠較實際音位數來得少，常有一個字形表示多個音位的現象；其中 /w/、/v/ 在書寫系統中，型體是相同的。如在回鶻文《金光明經》裡，作 w 的字型，自 /w/ 到 /f/、/v/ 都有人構擬。

(2)輔音和諧：和元音和諧的情況類似，回鶻文中的舌根音及小舌音必須與元音的發音部位相配：舌根音（k、g）配前元音、小舌音（q、ğ）配後元音。而在一個詞彙中，不能同時出現舌根音及小舌音。

如：kizig kizig 「順序」（k-g）

köwsäk toqılığ 「合於習慣的」（q-ğ）

3.聲調：

一般認為回鶻文的聲調與現代突厥語相同，僅存在重音，位置落在最後一個音節上。基於這個原因，回鶻文中的漢語借詞，聲調的特徵也幾乎消失。

4.音節結構：

回鶻文的音節結構基本上是 (C)V(C)(C)，以元音為核心，一個詞彙可由多個音節組成。

如：一個音節 tört 「四」

兩個音節 butıq 「樹枝」

三個音節 ānüklä 「產仔」

四個音節 bitiğüči 「書寫者」

(二) 回鶻文文字系統概述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回鶻文字母起源於粟特文字母¹⁸，依時代早晚不同，有 19~23 個字母。初由右自左橫式書寫，後改為由左自右直式書寫。但《高昌館課》為由右至左直式書寫，與漢文行文方式相同，此為這部文獻特殊之處。

回鶻文字母在字首、字中及字尾分別有不同的書寫型式，與現今的蒙文類似。因其字母數較音位數少，故在書寫系統中有一字母表多音的情況。因目前沒有回鶻文電腦印刷體，故臚列牛汝極手書之回鶻文字母表於茲，以供參考：

表 4 回鶻文字母表¹⁹

音质	词首	词中	词末	音质	词首	词中	词末
a	𐰽	𐰺	𐰽𐰺	ʒ			𐰽𐰺
ä	𐰺	𐰺	𐰽𐰺	r		𐰺	𐰽𐰺
i, i	𐰺	𐰺	𐰽	y	𐰺	𐰺	𐰽𐰺
o, u	𐰺	𐰺	𐰺	l	𐰺	𐰺	𐰽𐰺
ö, ü	𐰺	𐰺	𐰺	m	𐰺	𐰺	𐰽𐰺
b, p	𐰺	𐰺	𐰺	n	𐰺	𐰺	𐰽𐰺
w	𐰺	𐰺	𐰺	č	𐰺	𐰺	𐰽𐰺
ɣ	𐰺	𐰺	𐰺	š	𐰺	𐰺	𐰽𐰺
q	𐰺	𐰺	𐰺	s	𐰺	𐰺	𐰽𐰺
x	𐰺	𐰺	𐰺	z			𐰽𐰺
g, k	𐰺	𐰺	𐰺	ng		𐰺	𐰽𐰺
d, t	𐰺	𐰺	𐰺				

¹⁸ 鄧浩、楊富學，1999，《西域敦煌回鶻文獻語言研究》，甘肅出版社，頁7。

¹⁹ 本圖片出處：牛汝極，1997，《維吾爾文字古文獻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頁87。

回鶻文元音方面，書體為 a/ä 不分²⁰、o/u 不分、ö/ü 不分、i/ï/y²¹不分；輔音方面為 k/g 不分、b/p 不分。這在音位的辨認上自然產生一些困難，也因此產生不同的回鶻文的轉寫方式。依蔣建設的整理²²，目前回鶻文轉寫方式有兩種：

1. 標元音式回鶻文拉丁轉寫字母：

這是依回鶻語音內部規律，及比較語言學的成果，在轉寫的過程中明確分辨各個元音及輔音音位，並搭配特殊符號及拉丁字母來轉寫回鶻文。俄國學者吐谷舍娃、土耳其學者 Ceval Kaya 均採用此種轉寫法。

2. 不標元音式回鶻文拉丁轉寫字母：

與上述不同的是，無法透過字母確定的音位均不加分辨，保留原本型式轉寫下來。如日本學者庄垣內正弘。

本文採用標元音式的寫法。但因大多數的漢譯詞無法利用回鶻語音內部規律及比較語言學的方式判斷音類，針對這種情形，本文擇取轉寫符號的原則有二：

1. 對音中無法判定音類時，如 a/ä、o/u、p/b 等，均只用一種轉寫符號如 a、i、u 或 b 表示之。不當的音類劃分可能會造成漢語聲韻分合上的謬誤，故僅討論其可能的音類。

2. 轉寫符號儘可能避開國際音標，以避免音類與音值上的混淆。如 ğ 與 ɣ，ɣ 本身在國際音標中代表一種輔音音位，但我們無法確定回鶻文中與 q 相配的 ɣ，是否為現今國際音標中 /ɣ/ 的音值，故文中以 ğ 表示。

因本文已全面修訂《明代文獻〈高昌館課〉》中的拉丁轉寫，故下列出與胡、黃氏的轉寫符號對照表，以茲讀者比對參閱：

²⁰ 牛氏此表，雖然分列 /a/、/ä/ 兩個元音，但實際在回鶻文文本中，/a/ 與 /ä/ 幾乎沒有形體上的區別；即便在此表中，/a/、/ä/ 也只有詞首的位置時較看得出差異；詞中與詞末幾乎是一致的。

²¹ 同註 28，i/ï 跟 y 也是類似的情況，這兩組元音只有出現在詞首時會有書寫上的差異，出現在詞中與詞末時書體一致。

²² 蔣建設，2008，《回鶻—漢對音及宋元回鶻地區漢語方音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21。

表 5 本文使用的回鶻文轉寫符號

本文	胡振華、黃潤華
a	a
ä	ə
i/i/y	i/e/y
o/u	o/u/w
ö/ü	ø/ü
b	p/b
u	w
k/g	k/g
q/ǧ	k/g/ɢ
t	t
d	d
s/š	s/x
z	z
l	l
m	m
n	n
r	r
č	q/j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材料

本文採用歷史語言比較法。研究材料為《高昌館課》國圖本、東洋本、古香樓本共三個版本互相參照，進行第一手研究²³。此外，筆者亦已修正《明代文獻〈高昌館課〉》一書的轉寫約四百餘組；唯校對並非本文重點，故僅就行文提及的例證補充校對結果於註腳中，以供讀者參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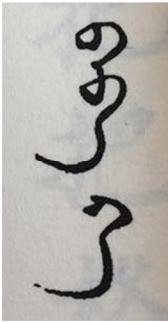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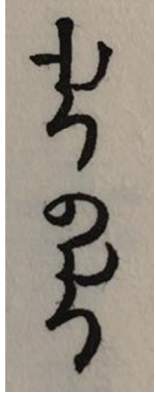
（四）本文的限制

回鶻文雖然是一種表音文字，但多有難以辨認音位的時候，這受限於回鶻文本身的書寫形式（一形多音）及語音特徵（如輔音和諧、元音和諧），許多

²³ 中國國家圖書館本中所闕之 3 篇，本文附錄書影於後。

對譯詞中的輔音及元音，只能透過回鶻詞語前後音節推測其可能的音類。如：

表 6 音類判斷舉隅

	<p>第 19 篇 把把格（使臣之名）</p> <p>此處筆者的判讀為 <i>babakā</i>。回鶻文書寫 <i>b/p</i> 同體、<i>k/g</i> 同體，判斷其音類是 <i>babakā</i> 的脈絡如下：</p> <p>(1)回鶻文 <i>b</i> 多出現在字首，<i>p</i> 則否；此為回鶻文人名，作 <i>baba</i> 判讀應屬合理。</p> <p>(2)回鶻文有元音和諧的現象，而此處人名分作兩段式書寫，可能是後段的元音沒有與前段的元音和諧，故分段書寫。因此後段的元音音類應為 <i>ä</i>，而非 <i>a</i>；而 <i>ä</i> 則配前輔音 <i>k-</i>，故推知此處回鶻對音應為 <i>babakā</i>。</p>
	<p>第 22 篇、23 篇亦力把力（國名）</p> <p>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國名中。此處筆者的判讀為 <i>ilibali</i>，即 <i>ili-</i> 與 <i>-bali</i> 分別是前元音段與後元音段，因此在回鶻文的書寫上分開，以符應回鶻文語音的內部規則。</p> <p>這樣的推測在明史中可以得到印證。《明史·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中即記載別失八里（東察合台汗國）更改國名為「亦力把里」²⁴。里為止韻上聲，力為職韻入聲；即便明代入聲可能已消失，里、力二字的主要元音亦不相同。《明史》的亦力把里可證實回鶻文應為 <i>ili-bali</i> 而非讀作 <i>ili-bali</i>；而這也是回鶻文字分段書寫的緣由。</p>

依照上述方法，在回鶻文書寫系統中字體相同的輔音及元音，可依語音結構邏輯推斷出其音類。如第 39 篇的「舍黑」*šiqi*，因回鶻文 *q* 只配後元音，故可判斷此處的元音為 *i* 而非 *i*。然而也有上述方法無法判別的時候，特別是音譯漢詞，因為漢語詞彙多為單音節，在缺乏前後輔音或元音的情況下，許多音類都無法推知，尤其是元音。因此藉回鶻文來觀察漢語韻部的分合較為困難。

²⁴ 《明史·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十六年，貢使速哥言其王為從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明史》，中華書局，1974，頁 8608。

另外，漢語與回鶻語的不對稱性，也導致某些輔音的觀察限制。筆者將在各小節討論時敘明。

四、《高昌館課》的漢回對音

（一）《高昌館課》漢回對音的類型

《高昌館課》中的漢回對音，可以分為三類：

1. 西域專有名詞：如地名：哈密、火州；人名：力伯顏答、鐵木真；物名：阿魯骨馬等。
2. 漢語詞彙（多為動詞、介詞）：這類詞彙多在回鶻文的翻譯之後，加上一個回鶻文的 [b]，再寫一次漢語的對音。如第 7 篇來文的第 5 行：

ärksin	gölüg	b	kin	saqlap	yir	sare	yumxap	b	čai
謹慎			謹	守	地	方	派遣		差

胡振華、黃潤華認為這裡的回鶻文 [b] 可能是括號的意思²⁵。這類 [b] 之後的回鶻文，皆為漢語詞彙的對音，無一例外。

3. 漢語借詞：這類詞彙與第 2 類不同，詞彙的前方沒有回鶻文 [b] 的標記，且多屬漢語的專有名詞。如：考例、頭目、都督。這類的詞彙可能於不同時期借入回鶻文中，如「都督」一詞，在唐、五代時就已經普遍出現於回鶻文獻中；而「考例」等詞較少在回鶻文獻中看到，可能在明朝時才被借入回鶻文中。

上述三類對音，第 2 類最能反映出譯者實際的語音現象；第 1 類與第 3 類在時代劃分上較為複雜，須有更多的文獻佐證，方能確定對音的年代。而第 1 類對音中，人名較地名更可能反映當代實際語音，因為地名的流傳可能因年代久遠、兼採義譯等因素，而無法確切反映當代語音。故在分析對音時，三類對音材料分別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²⁵ 同註 9，頁 1。

本文的研究兼採上述三種類型的對音。固然第 2 類對音價值最高，倘若只取第 2 類對音作為研究對象，材料性質均一，層次單純，可避免不必要的干擾。然筆者以為第 1 類及第 3 類中亦不乏當代的譯語，且第 1 類對音有一部分乃由回鶻語翻譯成漢語；這類詞彙翻譯的性質與另外兩類不同，恰能彌補回鶻語與漢語語音結構不對稱所導致的觀察限制。因此在層次概念清晰的情況下，兼採三種類型的對音相互參照，可能得以發覺純就第 2 類對音不易顯現的語音線索。

（二）聲母的討論

對音分析的限制

回鶻文中，p-、b- 書寫形式相同，k-、g- 書寫形式相同，且回鶻文的輔音沒有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因此回漢對音難以呈現幫系、端系或見系聲母內部的對立。幫系聲母對應回鶻文的 b-²⁶，端系聲母大致對應回鶻文的 t-²⁷，見系聲母對應回鶻文的 k-/q-；但這其中應仍有送氣／不送氣的對立，是無法透過回鶻文字母來表現的。

《中原音韻》知照系的音值（捲舌化與否）、能否與 -i- 相拼，是研究近代音時討論的重點。《高昌館課》要觀察上述現象亦有難度：除了回鶻文的 č- 可以代表兩套對立的聲母音類之外，回譯漢也常有省略漢語 i 介音的現象。因此在知、照系的例字中，我們無法單就三等 i 介音的有、無來斷定聲母捲舌音化與否。

以下分述各系聲母在《高昌館課》中值得研究的部分：

幫系聲母

²⁶ 胡、黃的拉丁轉寫大多作 /b/，只有滂母的「匹」作 pi、並母的「平」作 ping；然而這兩處的 p- 應改為 b-。本文中一律作 b-，這與回鶻文的語音結構有關，回鶻文的 b 可以出現在詞首，p 卻鮮少在詞首出現。

²⁷ 端、透、定三組字對應回鶻文的 t- 或 d-，看起來並沒有規律；但若進一步分析《高昌館課》中的對音，可以發現：端、透、定母的第二類對音，皆對應回鶻文的 t-，而 d- 只出現在第一類對音中，亦即回鶻地名／人名譯為漢語。至於回鶻文中的 d- 譯為漢語的端、透母，可能是在譯者的語感裡，沒有辨別出回鶻文中 t-、d- 的對立，或是無法在漢語中找出對應 d- 聲母的例字。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都與漢語聲母濁音清化的現象有關。

幫母有一組例外對音：「斑」qai，出自第 70 篇、第 72 篇的 qaraqai「虎兒斑」²⁸。回鶻文的 q- 通常對應的是見系聲母或曉、匣母，因此這組對音不太合理。筆者暫時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非系聲母

非系聲母對音見下表：

表 7 非系聲母對音

聲母	非母	敷母	奉母	微母
對音 ²⁹	法 wa(13) 封 wung(1) 蕃 wan(1)	妃 wui(1) 赴 wuu(8) 撫 wuu(3) 番 wan(10)	犯 wan(1) 服 wuu(2)	文 wun(10) 望 ung(28) 聞 wun(3)

非系的 4 個聲母，均對應回鶻文字母 w-。至於回鶻文 w- 的音類，如前文所述，自 /w/ 到 /f/、/v/ 都有人構擬，而 /f/、/v/ 這些音位都是因外來語而增生的。縱使我們無法透過回鶻文書寫形式判斷非系四個聲母在語音的差異，但仍須假設它們之間保有區隔。（如：非、敷母的 w- 理應為 /f-/；奉、微母的 w- 則可能是 /v-/。）

微母中，文、望、聞三字皆屬於第 2 類對音，沒有層次上的差異；然而「望 ung」的聲母已然演變成 u³⁰，不再具有擦音的成分。對於微母消失，併入影母、喻母的時代，自王力始已有討論。王力認為微母的 v 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紀，才變成半元音 w，最後成為元音 u³¹。如明末徐孝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2）中，微母的「問」、「文」和影母的「溫」、「穩」已列為同韻同聲母。其他如孫建元以崔世珍之《四聲通解》為材料，認為彼時微母已

²⁸ 據胡、黃的註解，「虎兒斑」指的是松樹。見《明代文獻〈高昌館課〉》，頁 135。

²⁹ 每個對音後括弧內的數字，表示該對音在《高昌館課》中出現的次數。

³⁰ 望 ung 對音亦可作 ong；然無論轉寫為 ung 或 ong，均表現出合口的性質，且不再具有唇音聲母的特徵。

³¹ 王力，1958，《漢語史稿》，中華書局，頁 154。

讀為零聲母，而將微母併入影、喻、疑母的年代提前到明中葉以前³²。然而就《高昌館課》此處的對音來看，「望 ung」的對音雖呈現微母音變的痕跡，且由開口變合口，與現今的讀音幾乎無二；不過合口的文、聞皆轉譯作 wun，共 13 例的數量亦不算低。若說《高昌館課》此處的對音是保守的表現，也難以解釋望 ung 的對音現象，更不用說《高昌館課》全書沒有見到其他保留中古音現象的例子，故此處的 wun 應是實際語音的描寫。故我認為，微母全面演變完成的年代仍須商榷；更有可能是北方率先完成這個演變，而以南京音為代表的明朝官話，至少在明中葉時還保留一部分的微母。《高昌館課》這組對音，亦揭示了微母的消失可能先發生在開口，而《高昌館課》的書寫時代正介於微母開口字之聲母 w>u³³的時期。

見系聲母

自唐、五代以來的文獻，見系字對應回鶻聲母一向具備一項特徵：在一、二等上有顯著的區別，即一、二等對應 q-，三、四等對應 k-³⁴。蓋因回鶻語結構中不存在連續元音的形式，故在對譯漢語時常有失落漢語介音的情形；唯有對譯見系聲母時，回鶻語會用 q-、k- 兩組對音的音位，來表現出漢語介音成分的差異。而在《高昌館課》中，也可以隱約看到這種對音的特色，見下表：

表 8 見系聲母對音

聲母	見母	溪母
一、二等	功 kung(9)	可 kǎo(3) qa(53)
	加 kiä(1) kǎ(2)	考 qau(24)
	皆 kǎi(6)	克 kǎ(5)
	格 kǎ(5)	
	減 kǎn(1)	
	間 kǎn(4)	
	管 kun(2)	
	感 qam(9)	
	骨 qu(8)	

³² 孫建元，1990，〈中古影、喻、疑、微諸紐在北京音系裡全面合流的年代〉，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 10-11。

³³ 此處的 w 可能是 v、w 等相近的音。

³⁴ 這在回鶻文《金光明經》中有清楚的呈現，庄桓內正弘、高田時雄、聶鴻音均注意到這個現象。

三、 四等	久 kǎō(11)	居 kǔ(7)	曲 kǔ(4)
	斤 kim(1)	給 ki(6)	遣 kām(1)
	吉 ki(2)	敬 king(4)	
	見 kǎn(5)	機 ki(2)	
	京 king(31)	謹 kin(3)	

然而《高昌館課》k/q 在不同等第間的對立並不如早期的文獻嚴整，而多出現在第一、三類對音中——如「阿骨魯馬」的「骨」qu、「考例」的「考」qau、「京師」的「京」king 等等。當代語音可能開始消失這種對立，且將見系聲母一律作 k-。以溪母為例，一等字「可」有兩種對音：kǎō、qa；其中 kǎō 為第二類對音，qa 為第三類對音（出自「可汗」一詞）。這證實了見系一、二等以 q- 為對音的現象，幾乎反映在早期的詞彙中；這個變化可能正處於發生的階段，因為見系第二類對音：「感」作 qam，仍保留了一等為 q- 的聲母。

精系聲母

精母有 2 套聲母：č-、s-。以漢語的「子」為例，有第 3 類對音「樣子 yang-čǐ」，以及第 2 類對音「綢子 ču-si」；其餘第 2 類對音皆對譯 s-，如「爵 sau」、「即 si」。由此可見層次不同所呈現不一樣的對譯傾向，而我認為在《高昌館課》譯者語感中，精母字應較接近於 s-。

精組字中的第一類對音，只出現在心、邪二母當中，意即彼時回鶻文沒有被翻譯成漢語精、清、從三個聲母，這亦間接呈現出精、清、從與心、邪兩組聲母之間的區別，及回鶻文本身音節結構中不存在符應精清從母音類的輔音音類等現象。

知、照系聲母

莊系及照系字，大抵可以分成兩組。第一組是莊、初、照、穿，對應回鶻文的 č-；第二組是床、疏、神、審、禪，對應回鶻文的 š-。在較早期的回鶻文文獻《金光明經》中，莊系及照系也是如此分作兩類。但禪母在《高昌館課》中對應兩種回鶻文聲母，平聲的誠、城作 č-，仄聲的拾、慎、盛、授作 š-；床母唯一的例字「事」為去聲，作 š-。就此，我們可整理知、照、莊組與回鶻文

聲母的對應情況如下：

表 9 知、照系聲母對音

聲母	知	澄			
回鶻字母	č	č			
聲母	莊	初	床	疏	
回鶻字母	č	č	仄聲：š	š	
聲母	照	穿	神	審	禪
回鶻字母	č	č	仄聲：š	š	平聲：č 仄聲：š

這樣的對應是能夠理解的。回鶻文的 č 可能的音值為 /tʃ/ 或 /dʒ/, š 可能的音值為 /ʃ/, 就發音方法來看, č 與漢語的莊、初、照、穿等聲母相同, 而 š 則與疏、神、審等聲母相同。禪母濁音清化後, 平聲反映塞擦音、仄聲反映擦音, 這種譯音的傾向同時出現在漢譯回及回譯漢的對音當中。

雖然回鶻文譯寫的特性, 難以如實呈現漢語的捲舌音, 但在審、禪母中, 有兩個字的對音保留了 -i- 介音: 書 šiu (10 例)、授 šiu (1 例), 這是頗為特殊的現象。這類現象可以有下列幾種解釋:

1. 捲舌音化尚未發生。只因回鶻對譯漢語 -i- 介音有條件限制, 只在某些對音類型中出現。但若此假設為真, 筆者目前無法歸納出介音保留的對音規律。

2. 當時正處於捲舌音變的時期, 而書 šiu、授 šiu 尚未捲舌音化, 故介音還清晰的存在。但即便如此, 回鶻文中三等介音失落的情況很常見, 亦不能斷定其他沒有 i 介音的例字已然捲舌音化。

3. 知、照系聲母皆已捲舌音化, 但少部分字尚保留了介音的痕跡。若此前提為真, 那透過回鶻文的對音, 可能得以證實捲舌聲母是能配 -i- 介音的, 而明代處於這種 $\text{ci} > \text{ʃi}$ 的階段。

再觀察禪母的「慎」šim, 為第一類對音, 出自 qanšim「罕慎」這個人名。因為 q- 輔音的存在, 可以確知「慎」的對音是 šim 而非 šim; 而譯者擇

取了「慎」作為 *šim* 的譯音，可以推測其時「慎」的 *-i-* 介音應已失落。「慎」的介音丢失，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即是聲母產生音變。另，審母的「舍」*šām*，譯自回鶻人名 *šāmdākā*「舍得克」，此處也能透過回鶻語音結構確定 *šām-* 的元音為 *ä* 而非 *a*；而用漢語「舍」來翻譯，看來「舍」的介音也已消失。這兩例 *i* 介音的失落，看起來都與聲母捲舌音化脫不了干係。由此，或許可推定「書」*šiu*、「授」*šiu* 所呈現的語音，即為捲舌聲母配 *i* 介音。

影系聲母

曉母有一個奇怪的對音：欣 *kim*，出自第一類對音 *yibulakim* 亦卜刺欣（人名），*kim* 譯為曉母的「欣」，而非譯為見母的「斤」*kim* 或「謹」*kin*，應該是書寫回鶻文時誤把 *q* 寫成 *k* 造成的錯誤。

日母

日母的對音不多。見下表：

表 10 日母對音

聲母	日
對音	戎 <i>yüm</i> (1) ³⁵ 兒 <i>r</i> -(20) <i>ra</i> (2) 爾 <i>r</i> -(2)

日母與回鶻文的 *y-* 對應，是回鶻文《金光明經》以來既有的現象。而據

³⁵ 「戎」*yüm* 是第 I 類對音，出自第 16 篇，為一組回鶻地名「戎地面 *yüm yir yangak*」。「戎地面」又稱「戎地」，應是明朝才出現的地名，在《明史》、《明實錄》、《明會典》中均有記載，但不見於元朝的史料中。現有一派學者認為該地即是魯迷城（*Rüm*），並指魯迷城為現今土耳其之君士坦丁堡。雖就 *Rüm* 的對音來看，的確符合明代「戎」的語音特徵，但是對於「地面」一詞，《明史》中有載：「今采故牘嘗奉貢通名天朝者，曰哈三，曰哈烈兒……曰戎……曰克亂，計二十九部。以疆域褊小，止稱地面。」又載：「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給事中鄭一鵬言：『魯迷非嘗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卻之，以光聖德。』」禮官席書等言：『魯迷不列《王會》，其真偽不可知。近土魯番數侵甘肅，而邊吏於魯迷冊內，察有土魯番之人。其狡詐明甚，請遣之出關，治所獲間諜罪。』帝竟納之，而令邊臣察治。」由此可知，「戎地面」不可能是魯迷城，故此處不據魯迷城之名 *Rüm*，來修正「戎」的對音。

蔣建設的研究，有些較早期的回鶻文獻，回鶻文的 ṣ 同時會對應穿、審、禪、日等聲母³⁶；明代中葉，日母與穿、審、禪等母的關係已然疏遠，故現在日母只與回鶻文 y -對應。

日母中的另外兩個例字：兒、爾，均用 r - 來表示聲母。回鶻語中的 $-r$ ，在過去的回鶻文文獻中向來只與漢語的來母對應；開始與日母匹配，是非常罕見的例子。「兒」、「爾」出自回鶻人名「法虎兒丁 *faqurding* ³⁷」、「鐵木爾 *tämür*」，此乃以漢語日母的兒、爾二字描寫回鶻文的 $-r$ - 音段。回鶻文的 $-r$ - 是舌尖顫音——現代維語亦尚有這個音位——，此音位為漢語所無，為何捨棄來母而擇日母翻譯，是個有趣的現象。

這裡要處理兩個問題，一個是「兒」、「爾」這兩個字是否已然從一般日母字中分化了？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中，原屬日母的「兒、耳、二」等字已出現在影母之下；不過以《高昌館課》「兒 *ra*」的對音來看，並非零聲母的型態。其二是若日母尚未分化，此時的日母接近什麼音值？對於中古日母的音值，以及其如何演變至現代的 $/ʒ/$ ，一直有許多討論。其中王力（1963、1979、1989：35）認為晚唐之後的日母字可能讀作閃音 $/r/$ ，元代再演變成 $/ʈ/$ ，但也不乏反對這個觀點的學者，如金有景（1985）、朱曉農（2007）³⁸。就《高昌館課》的翻譯情況來看，顯然在譯者的語感中，當代日母的語音特徵較來母更接近回鶻語中的 $/r/$ 。這在考證日母字的近代讀音時，或可作為一域外對音材料進行討論。

固然徐孝時期的北方語音，很可能兒、爾等日母字已然歸入零聲母，但倘若認為此處以兒、爾來描寫 $-r$ -，是日母失落、演變出 $/ʌ/$ 的表現，我認為證據並不充分。更理想的解釋是南、北的語音演變速度不一致，導致此處的對音還存有日母的痕跡。

綜觀《高昌館課》中的聲母對音，有如下發現：

³⁶ 同註 22，頁 51。

³⁷ 第 11 卷的人名「法虎兒丁」，胡、黃轉寫作 $/fa\text{-}ku\text{-}r\text{-}diug/$ ，今校為 $/fa\text{-}qu\text{-}r\text{-}ding/$ 。

³⁸ 相關的討論請見：單周堯，2016，〈半齒音日母讀音再探〉，《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51-180。

1. 微母開口字處於消失的階段，但仍保留著合口微母。
2. 見系一二等跟三四等之間的對立開始消失。
3. 應有捲舌音化的現象。
4. 日母中的兒、爾等字，尚未併入零聲母。

(二) 韻母及韻尾的討論

對音分析的限制

如前所述，回鶻文文字的特性，導致大多時候無法判斷對音的元音為 a 或 ä、i 或 ĭ、o 或 u³⁹。因此本文研究的重點將著重在於韻尾。

又，雖然回鶻文本身不存在複元音的結構，但長期受到漢語借詞的影響，在對音上可以如實地表現複元音。唯借詞的複元音是否也維持「元音和諧」的規律，這點難以得知。以現代維吾爾語為例，許多借詞都沒有元音和諧的現象。而本文保留單一的書寫型式，如 ai、ui 等，其可能代表的音類可能是 ai/aĩ、üi/uĩ 等。此外，雖然回鶻文可以表現漢語的複元音，但在翻譯漢語時往往習慣省略漢語的介音；這也會導致分析上的限制。

臻攝

表 11 唇音合口韻

明	魂合一	緩合一	換合一	刪合二
母	門 mun(1)	滿 mol(5) mon(2)	幔 man(1)	蠻 man(2)

臻攝魂韻的「門」對音作 mun，這是第二類對音，出自「衙門」yamun 一詞。在現代國音及許多漢語方言中，唇音合口字的 /u/ 介音都有失落的現象；西南官話中 /u/ 介音的丟失，最早也是發生在臻攝。⁴⁰然而此處的「門」mun，看來還保留著合口 /u/ 介音的特徵。類似的情況尚有山攝緩韻的滿 mol/mon；但在同攝的幔 man、蠻 man 等字當中，合口介音皆已消失。

假攝

³⁹ 無法推斷音類為何者時，本文暫記作 a/i/u。

⁴⁰ 侯精一，2002，《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頁 34。

表 12 麻韻對音

	麻開三	馬開三	禡開三
麻 韻	巴 ba(4)	也 ya(7) iä(3)	舍 ša(2) šī(3) šäm(1)
	牙 ia(2)	把 ba(16)	
	加 kā(2) kiä(1)	馬 ma(22) maq(8)	
	把 ba(3)	雅 ya(1)	
	沙 ša(2) šä(2)		
	些 sa(4)		
	花 qä(5)		
	麻 ma(4) mā(1) mat(27)		
	衙 ya(1)		

比較特別的是「加」的對音，有兩種：kā、kiä。kā 為第一類對音，kiä 為第二類對音，這或許提示了這類字的語音正經歷了如下的演變：ka > kia (> teia)。對於漢語聲母顎化的時間，學界向來莫衷一是；在《中原音韻》裡沒有聲母顎化的跡象，雖然有學者認為《中原音韻》存古的現象居多，漢語聲母在彼時可能已然顎化，但目前沒有更多的佐證材料能夠證明。《高昌館課》此處的對音，可能揭示了一個語音正在轉變的痕跡。可惜我沒有看到更多的例子，但以回鶻文譯寫時慣於省於漢語介音的傾向來看，這仍然是值得留意的現象。

「麻」跟「馬」皆用來對譯回鶻文中有輔音韻尾的音節：mat 及 maq，這些出自第一類對音。我認為是譯者判別不出回鶻文中的 -t、-q 一類的輔音韻尾所致。關於輔音輔尾的討論，請見下段。

入聲韻尾

表 13 入聲韻尾對音表

通攝	屋合一	屋合三	燭合三	江	覺開二		
	卜 bu(2) bū(5) 木 mu(1) mü(2) mut(6) 禿 du(6) 速 su(20) sü(1)	目 mu(14) 服 fuu	曲 kü(4) 束 šu(1)	攝	捉 čuu		
臻攝	質開三	術合三	沒合一	山	曷開一	屑開四	薛開三
	匹 pi 失 šī(1) šī(2) š-(3) 必 bi(3) 吉 ki(2) 密 mul(18) 膝 sī(1)	術 ču(1)	兀 u(5) ö(3) 孛 bö(3) 忽 u(5) 骨 qu(8)	攝	刺 la(7) lä(4) laq(3) ra(7) rā(3) 達 tā	捏 nā(1) 鐵 ta(3)	設 ša(1)
梗攝	陌開三	昔開三	錫開四	宕	藥開三		
	格 kā(5) 伯 ba(2) bā(2) bai(1) 帛 buz(2) ⁴¹	亦 yi(3) i(6) it(4) 隻 čī(3)	的 ti(35) dī(1)	攝	爵 sau(1) 掠 lau(1)		
曾攝	職開三	德開一					
	力 li(5) lī(9) 即 si(1) 域 yuu(2)	克 kā(4) ka(1) 或 kүү(1) 特 ta(3) 得 da(1) 黑 qī(22)					
深攝	緝開三			咸	合開一	乏合三	
	拾 šī(1) 給 ki(6)			攝	合 qa(1) 哈 qa(56) qī(1) 答 da(5) ta(1)	法 wa(13)	

入聲消失是可想而見的事，不過在《高昌館課》中還是有零星幾個看似有入聲的例子，所以大略提一下。

⁴¹ 「帛」 buz 這組對音胡、華認為是譯自漢語。我沒有找到更多的佐證，暫且採取保留態度。

屋韻的「木」尚保留數個 *mut* 這樣的對音，皆是出自第一類對音。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該譯音的層次較早；其二是在漢人耳中，已經聽不出來回鶻文 *mut* 的 *-t* 韻尾。

質韻中的「密」*mul* 出自地名「哈密」，這個回鶻譯成漢語的詞彙看似以 *-t* 對譯回鶻文的 *-l*；然而「哈密」之名最早見於西遼，彼時譯作「哈密力」，明朝時才改稱「哈密」。「哈密」可能是「哈密力」的簡稱，所以「密」未必是對應 *-mul* 的音節，也很可能不是譯自於回鶻語。故亦無法就這組對音來推斷《高昌館課》中還有入聲韻尾的痕跡。

「亦」有 3 種不同的對音：*yi*、*i*、*it*，都來自第一類對音，而翻譯的時期可能有早晚之差。「亦力把力」*ili-bali* 最早見於永樂十六年（1418 年）；「賽亦」*sayit* 這個人名最早可見於宣德五年（1431 年），但《明史》中翻為「賽亦得」⁴²，也就是以「得」來表現 *-t* 韻尾；人名「把把亦速」*baba-yisu* 則未見於史料記載，有可能是隨著來文的出現才有此譯音。綜言之，《高昌館課》中看起來像是保留入聲韻尾的對音，都能得到解釋。

陽聲韻尾

《高昌館課》中的陽聲韻尾，呈現 *m*、*n*、*ng* 三者不規律的對應。這種不規律的現象同時存在於三種類型的對音當中。東韻「戎 *yüm*」即為回鶻文的 *-m* 以東韻字來翻譯；臻攝如「敏 *mǎng*」、「慎 *šim*」、「斤 *kim*」、「欣 *kim*」，梗攝如「城 *čin*」、「政 *čim*」，這其中包含了三類的對音，意即無論是回譯漢、漢譯回，譯者似乎無法區別這幾種陽聲韻；山攝如「安」*am*、「遣」*kām*⁴³、「千」*sam*⁴⁴、「欄」*lang*⁴⁵等。這些詞彙應當都屬明代的對

⁴² 《明史·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天方，古筠沖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正統）六年，王遣子賽亦得阿力與使臣賽亦得哈三以珍寶來貢。」《明史》，中華書局，1974，頁 8621。

⁴³ 「安」*am*、「遣」*kām* 是第二類對音。

⁴⁴ 「千」*sam* 出自第三類對音「千戶」。明太祖創立了「衛所制」軍事制度，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千戶」一詞應出自於「千戶所」，而非出自於蒙古族的「千戶制」，其又稱為敏罕（蒙古語：ᠮᠢᠨᠭᠠᠨ，鮑培轉寫：*mingyan*）。可參考《明史·志第六十六·兵二》：「洪武二十六年（公元 1393 年）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內外衛二

音，所以山攝也被轉寫成 -m、-n、-ng 三種不同的韻尾。深攝、咸攝的韻尾 -m 仍保留在不少例字裡，如「林 lim」、「感 qam」、「男 nam」、「僉 sam」、「陝 šam」等共 20 例。一般而言，-m 韻尾的消失應是直接併入 -n，但《高昌館課》中除了用 -n 來對譯 -m，也有 -ng 譯 -m 的例字如「參」sang。

在《中原音韻》的韻類中，三種陽聲韻還保持著明顯的區隔。寧繼福、楊耐思等人也認為陽聲韻一般還維持著三種格局。然而就《高昌館課》的對音來看，陽聲韻的對應並不規則。

陽聲韻尾對譯不合規律的情況，整理如下表：

表 14 陽聲韻尾翻譯整理

	ø譯m	-n譯-ng	-n譯-m	-ng譯-n	-ng譯-m	-m譯-n	-m譯-ng
漢譯回	šām>舍	čīn>城	無	mīng>敏	yūm>戎	šīm>慎 kim>斤 kim>欣	無
回譯漢	無	無	安>am 千>sam 遣>kām	無	政>čīm	嚴>yan 減>kan 犯>wan	參>sang 欄>lang

由上表可知，不規律的現象多與 -m 韻尾有關。與 -m 無關的只有 2 例：mīng 譯「敏」及 čīn 譯「城」。「城」čīn 出自「柳城」⁴⁶，應為音譯兼義譯，此處可以忽略。所以排除「敏」mīng，其餘對音呈現了下列現象：

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餘年，多所增改，其後措置不一。」《明史》，中華書局，1974，頁 2196。

⁴⁵ 「欄」lang 出自第三類對音「膝欄」。膝欄是明代的一種制服。《明史·志第四十五·輿服志三》：「永樂以後，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膝欄，亦如曳撒，上有蟒補，當膝處橫織細雲蟒，蓋南郊及山陵扈從便於乘馬也。」《明史》，中華書局，1974，頁 1647。

⁴⁶ 「柳城」lokčīn 一詞，應該是指「柳中城」，即今日之「魯克沁」，高昌國曾在此設郡。這個地名兼採音譯與義譯，因為柳城自古以柳色聞名；因此「柳城」二字不盡然符合 lōk-čīn 的音節結構是可以理解的。

1. 漢語的 -m 韻尾有時譯為 -n 或 -ng。
2. 漢語的 -n、-ng 有時會譯成 -m。
3. 回鶻語的 -m 有時譯為 -n 或 -ng，或是陰聲韻尾。

我認為上述現象是漢語 /-m/ 韻尾開始消變的反映，意即當時某些咸、深攝的字可能開始併入 -n，但尚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因此某些回鶻文中的 -m，也無法精準的譯為漢語的咸、深攝字。至於假攝、臻攝、山攝、梗攝的漢語譯為 -m，可能是譯者刻意還原 -m 韻尾，因不諳音變規律而造成的訛誤。

回鶻文的語音系統中，-n、-ng、-m 一直都保持著對立，其出現在韻尾的條件也沒有限制；即使譯者是回鶻人，出現上述翻譯不規則的情況，也只有漢語發生了音變能夠解釋。根據明代韻書，明初的《洪武正韻》、《篇海類編》都存在獨立的 -m 韻類，而改編自明正統年間（約 1442 年）《韻畧易通》的本悟和尚重刊本，「在韻下標『重』以示相關。從所標情況看，『侵尋』與『真文、庚晴』關係密切，『緘鹹』與『山寒』關係密切，『廉纖』與『先全』關係密切，說明本悟時代實際讀音中的 -m 韻尾已與 -n、-ŋ 韻尾相混了。⁴⁷」雖然本悟的標示可能只是反映雲南方言的特點，但這個音變亦可能發生在北方的語言當中。至於明末的《韻略匯通》（1642），就合併了《韻畧易通》的 20 個韻類為 16 個，其中三組即為 -m、-n 韻尾的合併。作者畢拱辰為山東人氏，由此可知，不僅雲南地區的西南官話，明末北方官話中的 -m 亦已與 -n 混併。而《高昌館課》的來文集中於明永樂年間（1405）至嘉靖年間（1545），它的對音正揭示了漢語 -m 韻尾的消變，出現在這段時間之內。

整理《高昌館課》的韻母對音，也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1. 部分唇音合口字尚保留了 u 介音。
2. 「加」的兩套對音：ka、kia，可能呈現出顎化的痕跡。
3. 雙唇鼻音韻尾 -m 處於消變的時期。

關於譯者的線索

⁴⁷ 見：萬獻初，〈近古百種韻書 -m 韻尾消變的歷時進程〉，《勵耘學刊》2012 第 2 期。

《高昌館課》一些譯寫的現象，也許間接暗示譯者為漢人。其一是「速壇」的翻譯，「速壇」sudan 為君王之意，在第 64 篇中又譯為「速魯壇」suldān，這個詞彙可能來自阿拉伯語 sultan。在現代維語中，君王為 suldān，sudan 則是指水壺；因此在回鶻文中，「速壇」的正確拼寫應仍是 suldān，也可能存在著如現代維吾爾語一般 suldān 與 sudan 的歧義。然而在《高昌館課》共 87 篇中，僅有一處寫成 suldān「速魯壇」，其餘 15 處皆寫作 sudan「速壇」；若譯者為回鶻人，這個現象看起來不甚合理。

另外，耿世民曾指出，在後期的回鶻文獻中，t、d 兩個字母常會混用。⁴⁸ 這個現象在《高昌館課》中亦可見到，如「馬」at，在《高昌館課》中一律寫成 ad；「金色」altun 則寫作 aldun，而「四」tört 就沒有 t>d 的情況。雖然混用的原因尚不明瞭，但若擷取漢回對音詞來看，第 2、3 類詞彙均整齊地對譯 t-，顯示譯者在翻譯漢語時並無 t/d 混用的現象。我認為這也可作為譯寫者為漢人的旁證。

「克」ka 有一組不合理的對音，出自第 42 篇，為第一類對音：哈尼克 qanika。這個人名同時出現 q 跟 k，不符合回鶻語音的內部結構。假如不是筆誤，可能是書寫者不諳回鶻文語音結構而犯的錯誤。

第 70 篇有一個對音：「倒」tau，出自 sayit-taula-begim「賽亦—倒刺—伯斤」（人名）。按理回鶻文中不應有這種複元音結構，此處卻罕見地出現在人名中，可能是筆誤，或是暗示譯者為漢人，故而忽略了回鶻文的語音結構，寫出這種不合理的對音。

《高昌館課》的作者若是漢人，其所操持的語音可能較接近南京官話。

五、結語

元、明以來的近代漢語，研究者眾，其中亦不乏利用如《蒙古字韻》、《老乞大諺解》、《西儒耳目資》等對音材料來進行比較研究之學者。而本文透過整理《高昌館課》中的回漢對音，亦希冀能為描繪近代漢語的全貌提供一

⁴⁸ 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鶻文書導論》，新文豐出版社，頁 104。

些助力。縱使受限於回鶻文文字系統及本人筆力所及，許多現象無法做更進一步的解釋，但《高昌館課》仍呈現出許多值得注意的語言現象。

聲母方面，明中葉的微母處於開口消失的階段，但合口尚且保留著。而以往回譯漢的對音中，見系一二等跟三四等之間的明確對立，在《高昌館課》中也逐漸消失了。最後，根據部分翻譯回鶻文的漢語選字，可看出當時應已有捲舌音化的現象。

韻母方面，部分臻攝、山攝唇音的合口字尚保留了 u 介音。麻韻的「加」在對音中增生出 i，在當時可能是顎化現象的前兆。雙唇鼻音韻尾 -m 則正處於消變的階段。凡此種種，無法稱為證據確鑿的發現，但應能揭示明代中葉語音現象之一二。

最後，透過觀察幾個名詞的翻譯及部分語音對應的現象，譯者為漢人的可能性較高；再從微母、日母的音變表現，與明晚期代表北京音系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相異來看，譯者所操持的語音應為以南京話為代表的明代官話。本文並指出胡振華、黃潤華在《明代文獻高昌館課》中諸多的轉寫問題，亦希望此文能彌補以往對《高昌館課》語音研究付之闕如的遺憾。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明)火原潔，1988，《華夷譯語》，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冊，書目文獻出版社。
- (明)李東陽等著；申時行等重修，1976，《大明會典》共5冊，新文豐出版社。
- (清)張廷玉等，《明史》共28卷，1974，中華書局。
- 牛汝極，1997，《維吾爾文字古文獻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
- 王 力，1958，《漢語史稿》，中華書局。
- 李新魁，1983，《中原音韻音系研究》，中州書畫社。
- 竺家寧，1992，《聲韻學》，五南圖書。
- 侯精一，2002，《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
- 胡振華、黃潤華，1981，《明代文獻高昌館課》，新疆人民出版社。
- 耿世民，1994，《敦煌突厥回鶻文書導論》，新文豐出版社。
- 高田時雄，2005，《敦煌·民族·語言》，中華書局。
- 國家圖書館編，2009，《中華再造善本：高昌館課》共四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買提熱依木·沙依提，2004，《突厥語言學導論》，民族出版社。
- 楊耐思，1981，《中原音韻音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寧繼福，1985，《中原音韻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 劉迎勝，2013，《華言與蕃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交流的語言橋梁》，上海古籍出版社。
- 劉迎勝，2014，《絲綢之路》，江蘇人民出版社。
- 鄧 浩、楊富學，1999，《西域敦煌回鶻文獻語言研究》，甘肅出版社。

二、期刊、會議論文

- Louis Ligeti, 1967, Documents Sino-ouigours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20, No. 3, pp. 253-306.

万獻初，〈近古百種韻書 -m 韻尾消變的歷時進程〉，《勵耘學刊》2012 第 2 期。

包力高，1996，〈蒙古文字母 [G] 的古代讀音及其演變〉，《民族語文》1996 年第 2 期，頁 57-63。

田衛疆，〈明《高昌館課》諸函文年代考釋〉，《西北史地》，1984 年 4 期。

米熱古力·黑力力、阿普拉江·玉蘇普，2017，〈《高昌館來文》及其翻譯簡論〉，《民族翻譯》2017 年第 3 期，頁 15-24。

孫建元，1990，〈中古影、喻、疑、微諸紐在北京音系裡全面合流的年代〉，《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 3 期，頁 6-14。

烏雲高娃，2002，〈日本學者對明「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狀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 年第 6 期，頁 19-24。

馬克章，2015，〈從《高昌館課》看明代漢語在西域的發展變化〉，《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15 年第 4 期，頁 32-35。

張淑萍，2010.6，〈顎化作用在國語中的例外演變〉，《興大人文學報》第四十四期，頁 157-178。

陳秀琪，2005，〈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舌化的前化運動〉，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單周堯，2016，〈半齒音日母讀音再探〉，《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51-180。

三、學位論文

張鐵山，2002，〈回鶻文獻語言的結構與特點〉，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莊子儀，2011，〈回鶻文《金光明經》所反映的音韻現象〉，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蔣建設，2008，〈回鶻—漢對音及宋元回鶻地區漢語方音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四、網站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ctext.org/zh>

「地名規範資料庫」 <http://authority.dila.edu.tw/pl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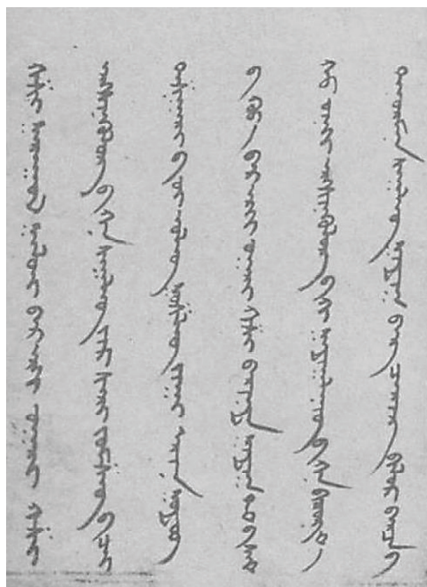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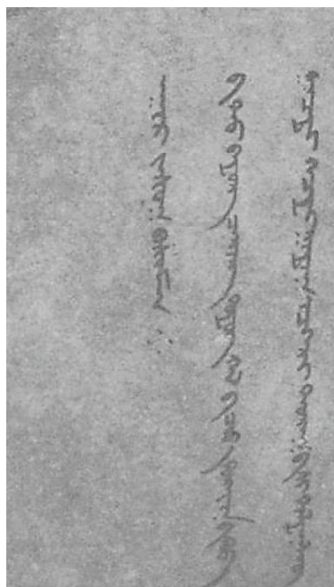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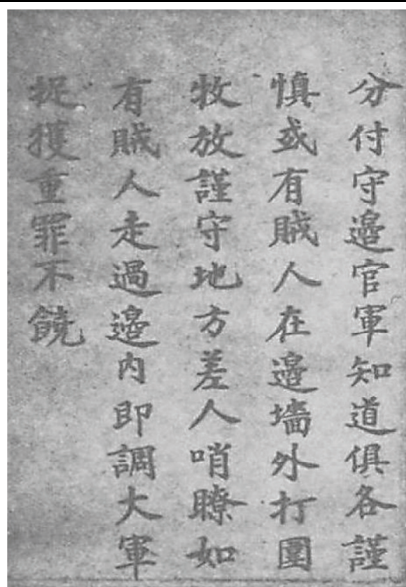
附錄

1. 東洋文庫本第8篇（對應中國國家圖書館本第7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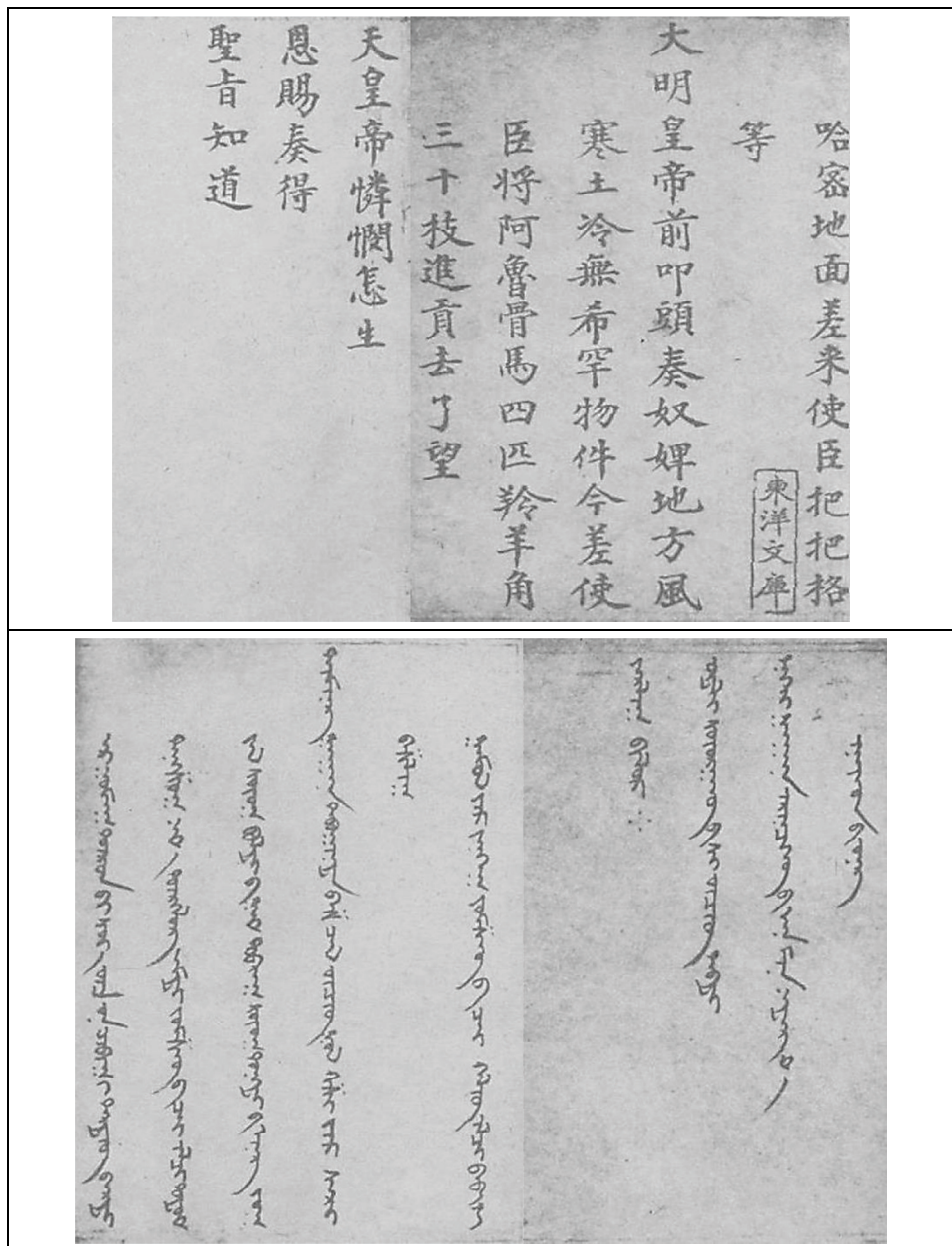
上右：東洋文庫本第8篇漢文

下右：東洋文庫本第8篇回鶻文頁一

下左：東洋文庫本第8篇回鶻文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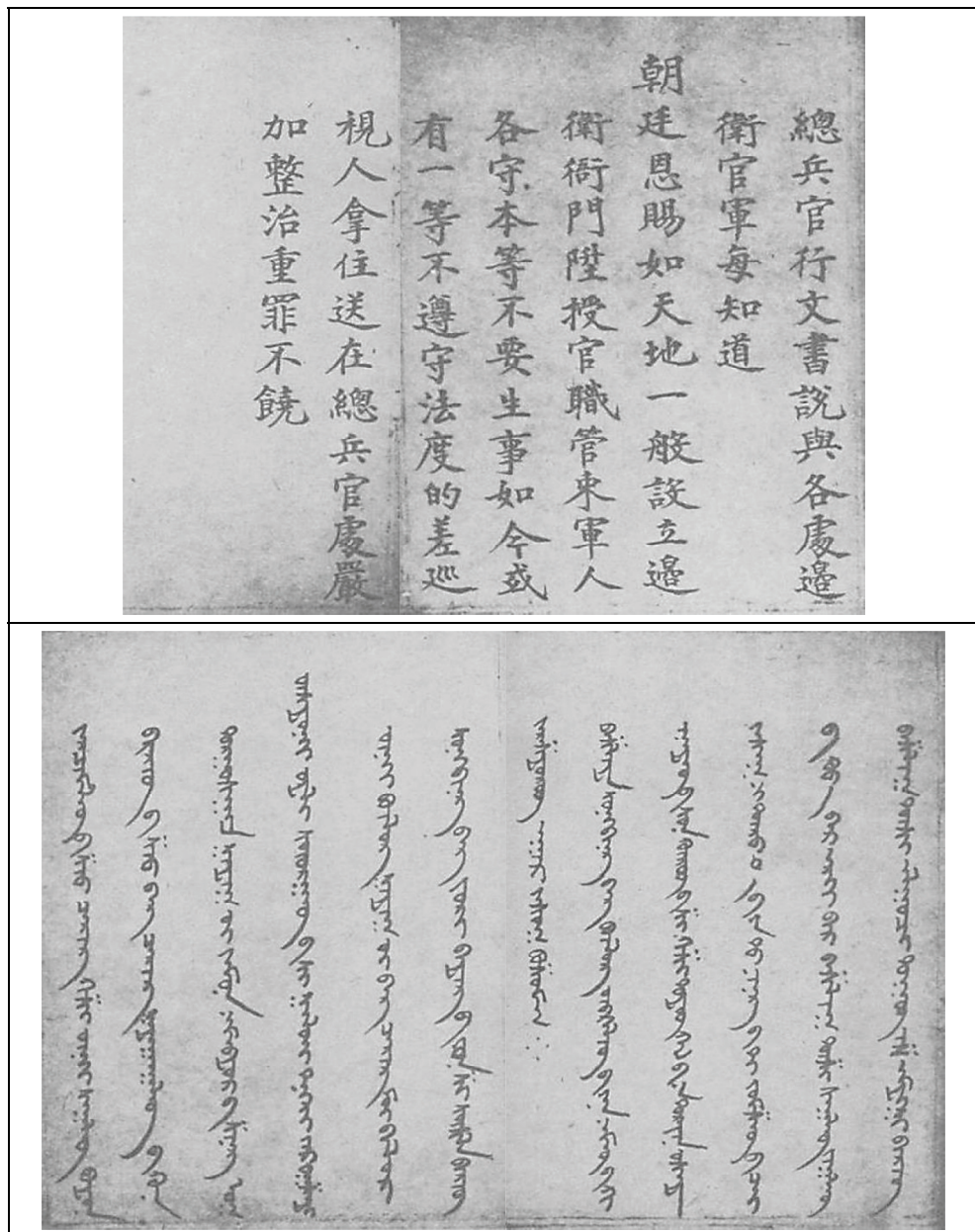


2. 東洋文庫本第1篇（同古香樓本第1篇）



上：漢文頁（行文為由右至左） 下：回鶻文（行文為由右至左）

3. 東洋文庫本第3篇



Transliteration Study of Chinese and Uyghur in “GaoChang-Guan-Ker”

Chuang, Tzu-yi

Abstract

“Gaochang Guan” (高昌館) is one of the FourYi Guan (四夷館) set up by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Ming 永樂 period. In addition to cultivating translation talents, this institution also collected the memorials of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Ming, which was the “Gaochang-Guan-Ker”.

“Gaochang-Guan-Ker” not only has the Chinese-Uyghur comparison, but also includes many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the Proper Nouns and the Chinese loanword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se pairs of vocabulary to observe the Chinese phonetic phenomenon of Ming Dynasty.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of the article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the versions of the text and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Gaochang-Guan-Ker”.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paper and the phonetics system of Uyghur. The fourth paragraph first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in “Gaochang-Guan-Ker”: the first is the Proper Nou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second is 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the third is the Chinese loanwords; Then, the initials and final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Chinese and Uyghur, explain the phonological phenomena that are worth to investigate.

Through 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in the “Gaochang-Guan-Ker”, this paper infers that the Chinese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15th to the 16th centur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The initial 微 without the medial “u”

is disappearing while the ones with the medial “u” are reserved, 2. The disappearance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等第 first, second and third, fourth, 3. The initials may become retroflex, 4. Some of the labial still retains the medial -u-, 5. There is a sign to pharyngealization, and the 6. The finals -m is deteriorating.

Keywords: transliteration Study, Gaochang, phonetic phenomenon of the Ming